

沈日文

阁楼人语



《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

作家出版社

I267
523

阁楼人语

■ 《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

史日文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沈昌文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8

ISBN 7-5063-2740-6

I. 阁… II. 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6051 号

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

作者: 沈昌文

责任编辑: 应 红

装帧设计: 李颖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150 千

印张: 10.25

插页: 5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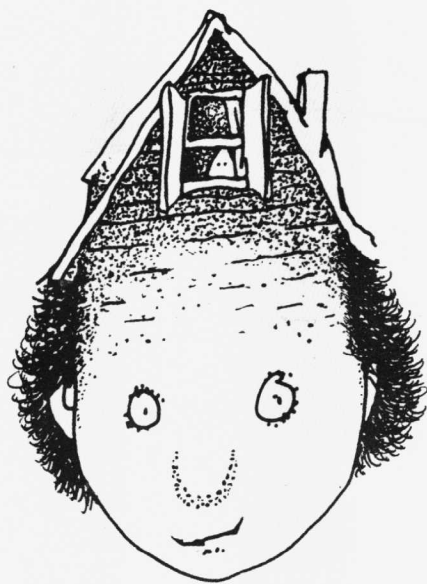
印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740-6

定价: 2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Silverstein

我喜欢把出版人形容为阁楼里的单身汉，他从阁楼的窗子里往外看，而窗外的人也看到窗里的灯光。

——沈昌文

B6662/02



阁楼里的男女们 丁聪

序

有无之间

王 蒙

读 2000 年 11 月 9 日《南方周末》上沈昌文公的《回忆读书》一文，浮想联翩，感慨系之。那些年的《读书》，实在是一个亮点，如果不说是一朵月月开放的奇葩的话。而且，现在回想起来谈起来给人以俱往矣的不胜今昔之感。

沈公总结说，或者更正确一点沈公与吴彬同志共同总结说，办这个刊物的经验是三无：无能，无为，无我。这就把问题提升（按：“提升”云云这是港台说法，其实我们的习惯是说提高）到老子哲学上来了。

《道德经》上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没有比用出版家编辑家作例子更能说明老子的这个绕脖子的命题了。出版家编辑家只有进入兼收并蓄的“无”的状态，即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无过分的圈子山头（有意或无意的），

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即为个人的名利积累的动机，才能兼收并蓄来好稿子，也才能真正团结住各不相同的作者，才能真正显出一种恢宏，一种思稿若渴一种思贤若渴的谦虚和真诚，才能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吸引力容纳力——港台说法叫做磁性。

有时候，一个很好的很可爱的很纯洁的很用功很执著认真的学者却硬是做不成一个好出版者好编辑，就是因为他们太“有”了，他们有“有”的功夫——有定见，有一派或一种观点，有很强的学派烙印和思潮色彩，有来历有渊源有自己在学术思想上的固定位置或预期的固定位置，有一拨学友一拨以类聚以群分的应和者配合者合作者切磋者，他们更有自己的个人的学术活动学术预期学术名望学术项目学术出访学术时刻表与学术自信和学术风格学术个性，他们是“这一个”，他们习惯于做独胆英雄，他们习惯于单挑独鸣，与众不同，与俗鲜谐，自成一格，放在哪儿都显出个人的光芒来。

然而编辑与出版更多的是一种组织工作，群体的工作，服务即侍候人的工作，太“有”了就干不成了。上述的那些清高和自爱的学人们则没有至少是缺少“无”的功夫，他们从不把目光注视到自己的“无”上。他们不可能虚怀若谷地去团结作者服务作者，他们自己就是优秀的作者，他们凭什么跑来跑去为他人做嫁衣裳？他们自身就是行家里手，凭什么再去请教别人倾听别人？他们的师长、同学、同行、同道、私淑弟子至少是跟随者信奉者

崇拜者已经很多很多，何必再去扩大作者的队伍与上心维系原有的队伍呢？像“读书服务日”这一类劳什子，清纯优秀的学者们是不屑于去做的。

这里所说绝无扬编辑而贬学者之意。学者有自己的无，不跑腿，不看人眼色，用不着太左顾右盼也用不着四面八方统筹兼顾，不费太多的时间做行政公关方面的俗事，也绝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不论你是泰山压顶还是蛤蟆闹坑，能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一条道走到黑；这样，才能我行我素做得成学问成得上至少是希望成为一代学人的代表人物，最后还能成为一代宗师一代昆仑。这样也才能明辨是非，臧否清晰，党群伐异，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这样的好学者也许可以对学术思想思潮本身做出精彩的贡献；他们也许能写出好文章写出好书；也许他们能提供一种独特的声音独特的角度；也许他们能编好一种学派刊物学派丛书或者同仁刊物流派丛书，但是他们无法像三无人士沈昌文吴彬一样编出那样的宽阔、影响和质量来。

有之以为其利，无之以为其用。老子的这一命题用在这里就是说，“无”并不真是什么都没有，你真找几个大草包，别说编《读书》，就是编《麻将指南》也不会编得好的。他们的“为其利”的“有”是有追求，有操守，有容量，有热情，有大的思路，有服务精神，敬业精神。他们是有一种真正珍惜编辑这个事业的态度的，他们不玩票，不会采取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的高

雅的，不让他们编了，他们确实很失落很悲哀，这是不可以嘲笑的。当然，为其利还因为有前辈和有关领导的支持爱护，有沈文中提到的众师长和同仁的支持，有这么一个刊物，有三联书店的影响和领导，更有以北京为基地的这样一个人文环境（各地奋起效《读书》之尤者多赜矣，都有不小的成绩，但是整体上看，差多了，原因即在此）；如果这些主客观条件都是无，你还能闹出个啥来？

有了上述这些好条件，那就看你能不能无之以为其用了，不能无之而是太多的主观性自我性，就会把好端端一个利，一个已有的“有”渐渐糟蹋掉。

有之以为其利，无之以为其用，说明的有与无的互补关系，叫做“有无相生”。还可以说，“无”是“有”的一种存在方式，是“有”的一种升华。“无”是一种趋向于零的心态，并不就是零。那么趋向于零的心态又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呢？一曰以无限作为参照，有极大的胸怀。如果以零作参照只有极小的胸怀，就只能趋向于无限大了。二曰这种无是一种弹性，不是刚体的不可入性。三曰容受性，如老子讲的，一所房屋，因为它的四壁之内是无，才能使用，反过来说，如果你的心胸的库房已经满满堂堂，必然丧失了一切容受的可能。四曰服务心态，自己既然是无，其用便在于为众人的有服务。最后是无我状态，无欲则刚，有容乃大；也不可能绝对无我，然而，老子说得好，无私，故能成其私。太私了呢？便只能闹笑话啦。叫做：有到无处渐应

手，有到无时正得心。叫做：无是一种大有真有的状态；更是一种真有万有而不是私有独有的契机，是万有的生长点万有的源泉——是故有生于无并且有无相生，是有的最高形式。马恩也是这样论断的，无了产才有未来，无了锁链而将拥有全世界。治大国如烹小鲜，何况办一个刊物乎？沈昌文和沈以前的《读书》诸君，其实办刊物办得平平淡淡，状态似是老农收麦子，麦子熟了收割就是啦，这就近于无为了。来了好稿子，有时候带着泥巴带着草屑照用不误就是了；有一点点辛苦，但算不上什么大事。而撅着腓努着劲捶着胸急赤白脸割麦子的都是力巴头。力巴也没关系，肯于学习肯于继承一切好的东西就大有希望。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说明无其实也可能即是一种有，承认无知其实正是一种知，换句话说真正的知必然认识得到自己某方面的无知，自知之明恰恰是最可爱最难得的知。而最可怕可厌可笑的是明明无知却自以为什么都知道，强不知以为知，是一种愚蠢更是一种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的罪过。

无能云云，一种是真无能并承认自己无能，这是中上。有一定的能力但更看到自己的无能方面，从而团结和聚集所有的有一得之见者，并把他们的力量集中起来发挥出来，这是上上。自己有能并从而以自己为中心搞自己个人的一套，虽然自己有所建树却失去了助力失去了磁性；这是中下。而自己无能，偏偏作有能状作教训旁人状呢，那就是下下了。

用抽象一些的语言来说，上善以有有无、存有用无、知无守

有；中善以无为无，无用无害无咎（这是无的低级状态）；下善以有为有，终无大用（这也是有的低级状态）；甚恶以无为有，欺世盗名，害人害己。

至于无我，对于某种类型的人就更痛苦更困难一些了，呜呼，三无亦大不易矣，呜呼！

自述

出于无能

沈昌文

到这篇文章刊出之时，也许可以在熟人之间吹一句牛：我已经整整干了五十年出版。五十年，不是小数了，满够吹吹的。五十年里，有三分之一年头在编《读书》杂志，似乎更可以一吹。因为据说这杂志名满天下，至少是一度名满年轻的知识界。

其实，说五十年，已属夸大。连头搭尾，无非在出版界正正式式干了四十五年。以后五年，已经让你“颐养天年”了，只不过是自已还赖在这行业里插科打诨混日子而已。至于《读书》杂志，尽管在这里担任过什么什么名义，可是第一没赶上创办这杂志时一年光景的最辉煌岁月，第二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只不过在这里干个兼差，到了最后的几年，有可能一心一意、像模像样地来干一番了，可是裁判员 time-out 的哨音响起来了。

朋友们约我回忆《读书》杂志，当然可以让我满足自己的发

表欲，但更重要的，是觉得应当趁这机会把编杂志的真实情况说说。我在这杂志年头不少，不过所干的活，充其量是一个“管家”。我们（我和几位长期坚持的同事）之所以可以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复杂年代里，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从两三万到十三四万，这也许可以说是“发扬光大”吧），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为了写这回忆，把这意思同老同事吴彬、赵丽雅她们商量，大家都赞赏这看法。因一己之无能，才能联络到那么多的能人，把这么一个其内容远远超过我们知识水平的杂志，有声有色地办了这么多年——这可以说是我们的共识。

下面是一些回忆片断，大体上按时间顺序写的。

一．思想评论杂志

《读书》杂志创刊于1979年4月，实际筹划工作是从1978年底开始的。1978年底，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八十年代人们艳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年11月召开。想像得出，这次会议过后，思想界包括出版界的活跃盛况。在这情况下怎么会产生这么一个杂志，我无法言其详，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在当时的思想氛围下，一些屡经沧桑的老人想重新办起一个他们创办过的理想的杂志。我以后在《陈原出版文集》中读到：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回到上海。生活书店把原来一个宣传

推广的刊物《读书与出版》改成一个以书籍为中心的思想评论的综合性杂志，由史枚主编，1947年春史枚调香港，由我接办。编委会有周建人、杜国庠（守素）、戈宝权、陈翰伯和我五人，我们每个月聚会一次，定选题，分任务，一直出到1948年冬，因政治环境恶化而停刊。回头一望，这个杂志在那‘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起了我们预想不到的作用，特别是第一线刊物《民主》、《消息》、《文萃》相继被迫停刊，这个小刊物对国统区广大读者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第464页）

很明显，后来确定的《读书》杂志的宗旨：“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所来有自。我当时并不很知道这个宗旨的分量，无非是执行而已。有一天，听一位舆论界的领导人在嘟囔：一家出版社，怎么办起思想评论杂志来了，那不已经有了《红旗》吗！这一下，我才怵然有觉，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回头看看创刊当时的组织安排，应当也是大手笔所为。《读书》创办时，是属于国家出版局政策研究室的，机构则放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名义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当时不是独立机构，仅有一名义而已）。的确，这一来，出版界的各路英雄豪杰很大一批集合在一起了。

我不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坚定的别的什么主义者。等到我不时因为自己没把“思想评论”搞好而到有关机关去做检讨时，心里免不了常常浮起一个念头：干吗还要搞什么“思想评论”呢？咱们不如专门去做些书刊评介得了。在老前辈

们的主持下，总算没让我退缩。现在来看，前人们为我们创办、设计、坚持了这么一个“思想评论”杂志，它的意义和价值，实在不下于我们后来盖造的那座大楼。我敢说，三联书店后来在我主持下，费尽牛劲盖个把大楼也许还算勉强做到了，可是就我个人说，怎么也不会有这魄力和能耐去办出一个“思想评论杂志”来。

二.“CC 俱乐部”（一）

《读书》的老前辈，列出名单有一大批，细说太繁。这里只先说两位“帅上之帅”——陈翰伯和陈原。

“文化大革命”中，两位都是出版界“黑帮”头头，屡被戴高帽子游斗。特别在反“复辟回潮”时，被认为是出版业“复辟”主将，革命小将们于是将这“二陈”命名为“CC 俱乐部”。应当说小将们看得很准，因为其后，虽然形势丕变，但凡论及改革开放早期出版界种种兴革，都离不开这“二陈”大名，尤其是提到《读书》和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至少就我在《读书》的经历言，将此 C 与彼 C 合称，信其不诬也。

陈翰伯同我说事，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点头你就做，我摇头你甭干。凡事一弄清情况，他马上就 yes or no，绝少拖延不决。但这不是说他没民主作风。《读书》1981 年四月号上那篇《两周年告读者》，是他亲自执笔的。此老当时已贵为全国出版行业的最高行政主管，但还是四十年代办报的那种亲历亲为作风，亲

自为报刊写社论。他为写此文，找我谈了不止一次，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后来写出初稿，再让我提意见。我当时为创刊号上那篇题为《读书无禁区》的文章，觉得压力太大，请他关注。他要我仔仔细细地说了情况，于是在文章中加了一大段态度鲜明的支持这篇文章的话。此后十多年，我不时诵习此文，深深觉得自己同前辈相比差距太大。十几年里，我为《读书》执笔的代表编辑部说话的文字可谓多矣，可哪一篇有过如此鲜明的态度！

陈翰伯老人同我讲的另一番话，也是我永远牢记的。

有一次，我为《读书》写了一些什么文字，拿去给陈老看。他看后找我去，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沈昌文，你以后写东西能不能永远不要用这种口气：说读者“应当”如何如何。你知道，我们同读者是平等的，没权利教训读者“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你如果要在《读书》工作，请你以后永远不要对读者用“应当”这类字眼。

我以前多次听此老发挥过永远不要把《读书》办成机关刊物的宏论，说实话，听后并没有太在意。这次此老一发挥，听了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业务观念。到《读书》前，我已有近三十年的编辑出版工龄，可算已是老于“编辑”此道了。但是可怜见的，到了这时，我才懂得编辑对读者的正确态度应当如何。

《读书》以后的许多做法，都是在陈翰老这番谈话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

三．“CC 俱乐部”（二）

另一个“C”，即陈原先生。此公同我较熟。1954年，我在人民出版社当校对，忽被奉派到总编室给总编辑们当秘书。当时陈原先生是领导成员之一，我就坐在他对面。如是者三几年，日日受他熏陶。可以说，这几年是我一生的出版学徒生涯中收获最多的一段，我称它为我的“研究生阶段”。照这说法，陈先生当然是我“研究生导师”了。

现在陈原先生主持《读书》，他的种种主张，我听了下来，许多并不陌生。原来1957年以前，他们这些解放后中国出版界第一代元老，思想开明的，天天所议论的振兴出版的做法，大多是“以文会友”，“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作家是衣食父母”，“开放唯心主义”，“重印解放前学术旧著”，“研究日本明治时期的翻译经验”，“拿来主义”等等，谈及的作家主要是：陈寅恪，陈登原，陈达，张荫麟，陈岱孙，吴文藻等等。这些“话头”，我天天耳濡目染，等于白天黑夜都在给我上新课。可惜的是，到1957年话头都给打断。过了二十多年，基本上还是这么些人，又借《读书》杂志把“话头”接上。现在来看，情况比较分明：四十年代的一些开明知识分子，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思想文化的话头，但他们并没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这类“话头”，可能源头还在“五四”，恕我浅学，难以说清其间关系。）五十年代上半期，想接这“话头”，没接上。直到